

《中州启札》与金元之际北方士人的文学书写^{*}

慈 波

内容提要 吴弘道编选的《中州启札》是现存唯一元人书简总集，传本罕觐而内容丰富。吴弘道本于北方下层文士立场，借《中州启札》表达对金元之际北方文化的体认，并由此呈现转型时代形态丰富的士人文学样貌。南宋末年启札文体日益虚化，冗滥烦读。中州士人通过质实简古、传事述情的畅达书写，剥离启札文化中的繁文缛节，实现了启札的文体功能回归，完成了对南方文风的去蔽。《中州启札》中有诗歌十二首、词作四阙，属于不见于其他文献的逸作。启札往复中的诗文交流，带有文艺相娱的自然组合意味，呈现了金元之际北方文坛的现实生态、交往特点与地域特征。

关键词 吴弘道 《中州启札》 金元 北方士人 吕逊

吴弘道编选的《中州启札》是现存唯一一部元人书简总集，刊刻于大德五年（1301）。全书共分四卷，收录赵秉文、元好问、许衡、商挺等姓名可考的四十八人共二百篇书简，广泛涉及金元之际北方士人的日常生活，举凡政务协调、人事请托、学术讨论、寒暄沟通、文学交流甚至子女教育等方面，都在其中有生动体现。对于史料稀缺的金元北方士人相关研究领域，此书是难得的一手文献。

不过《中州启札》传本罕觐，清代藏书家黄廷鉴就已感叹其为“当世绝无仅有之书”^①，张金吾、黄丕烈等人所鉴藏者皆为钞本，而存世的元刻孤本则度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尚未见学界利用。仅从文献角度而言，除去元好问、许衡等数人有别集存世外，《中州启札》中就约有一百五十篇书简为《全元文》所失收。书简中颇有友人之间传抄邮送的诗词作品，也多为《全元诗》《全元词》等大型总集失载。除了史学界对书信授受所揭示的士人网络有所关注^②，《中州启札》所呈现的北方士人的文学生态，所揭示的文体选择与文学趋向，都属于尚待探研的新鲜话题。

一 《中州启札》的编选及其文学面相

《中州启札》的编选者吴弘道是一位元初北方中下层文人，身世材料很少，诗文作品也未见传世，锺嗣成《录鬼簿》中有其简单介绍“吴仁卿名弘道，号克斋。历官至府判致仕。有《金缕新声》行于世，亦有所编《曲海丛珠》。”贾仲明吊词则云“克斋弘道老仁卿，衣紫腰金府判升。银鞍紫马敲金镫，锦乡中过一生。老来也致仕心宁。《手卷记》《子房货剑》，锦乐府天下盛行。《曲海丛珠》《金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宋文》未收书简辑考暨宋代书简会通研究”（项目编号20BZW060）阶段性成果。

^① 黄廷鉴《第六弦溪文钞》卷二《爱日精庐藏书志序》，清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第7a页。

^② 参见朱铭坚《金元之际的士人网络与讯息沟通——以〈中州启札〉内与吕逊的书信为中心》（《北大史学》2016年第20期）及 *Indigenous Elite Networks and Mongol Governance in Thirteenth-century North China*（《饶宗颐国学院院刊》2018年第5期）。

缕新声》。”^①可见吴弘道与传统文人多有不同，“天下盛行”云云，更表明他当时以曲名世^②。《录鬼簿》所著录的杂剧《手卷记》《正阳门》《子房货剑》《楚大夫屈原投江》《醉游阿房宫》五种都已亡佚，散曲集亦已失传。《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乐府新编阳春白雪》等书载录其曲，今人隋树森《全元散曲》辑录有小令三十四首，套数四首。

许善胜为《中州启札》所作序言，称“仁卿名弘道，金台蒲阴人也”，蒲阴在元代隶属保定路，可知吴弘道世为北人。序文又称他为“江西省检校掾史”^③，则在元初仕路艰窘的情况下，吴弘道又转徙南方。根据方志，泰定二年（1325）吴弘道任建康路总管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发架阁”^④，此后不久就应该以《录鬼簿》所说的“府判”致仕了。《录鬼簿》将吴弘道收入卷下“方今才人相知者，为之作传，以《凌波仙曲》吊之”类目当中，而《录鬼簿》成书于至顺元年（1330），故吴弘道当卒于此。

吴弘道对中州文献极为熟悉，《录鬼簿》中颇多曲家材料即由他提供^⑤。这一关注同样表现于书简搜罗，许善胜表彰他“哀中州诸老往复书尺类为一编，凡若干卷，辍己俸钱梓”^⑥。即使不考虑书简散于众手、缀集为难的棘手之处，吴弘道沉沦于下层吏职，却力任工费将之刊版，所倾注的心力确乎难能可贵。这一元刊本仅见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著录^⑦，今归静嘉堂。此本左右双栏，双鱼尾，版心上以“中州几”标书名卷数，下标页码。每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二字。书首之序及赵秉文至元好问之《答聪上人》共六封书简皆为缺逸抄配。书前衬页抄有宋宁宗杨后子宫词五首，首尾分别钤有“归安陆树声藏书之记”“归安陆树声所见金石书画记”两印。所抄补之卷一首页，钤有“马玉堂”“笏斋”两印。书末抄有黄丕烈跋语，钤“吴江凌氏藏书”“凌淦字丽生一字砺生”“归安陆树声藏书之记”三印。可知此书在陆氏之前，为海盐马玉堂（1815?—1880）与吴江凌淦（1833—1895）故物。元刻本时世久远，纸墨晦暗，卷中颇有阙文。但文字精审，讹误甚少，特别是书简的作者标注全备，文献价值很高。自版本而言，又为其他传本所从出，且系孤本仅存，尤其值得宝贵。

到明成化三年（1467），《中州启札》得以重刊。书前有许善胜序、翁世资重刊序，张金吾曾予著录，并称“影元抄本中多阙文，兼有误字，藉此得以校补，亦快事也”^⑧。实际上不仅是钞本可据明刻本校订，现存的元刻残本也待之补阙。此本仅见私家收藏，为黄裳得之于铁琴铜剑楼瞿氏后人，据书影可知，此书大黑口，双鱼尾，四周双栏，每半叶12行，行24字。版心题“中州启札”，下为页数。

① 锺嗣成、贾仲明撰，马廉校注《录鬼簿新校注》卷下，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版，第124页。

② 涵虚子（宁王朱权）《词品》称“吴仁卿如山间明月”，列为马致远、白朴等十二人之后的二等当中，显然是由曲家待之。张可久有《秋思和吴克斋》，则两人亦为旧识。

③ 吴弘道《中州启札》卷首许善胜“序”，静嘉堂文库藏元刻本，第1b—2b页。此序《全元文》失收。

④ 张铉《至大金陵新志》卷六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92册，第335页。

⑤ 《录鬼簿》卷上“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五十六人”部分，锺嗣成按语称“其所编撰，余友陆君仲良，得之于克斋先生吴公，然亦未知其详。余生也后，不得与几席之末，不知出处，故不敢作辞作传以吊云。”（《录鬼簿新校注》，第99—100页）则这五十六人的编撰与出处部分多得之于吴弘道，可知吴弘道对于当时曲家的创作与生平情况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⑥ 《中州启札》卷首许善胜“序”，第2a页。

⑦ 黄丕烈曾寓目《中州启札》四卷，有题跋称“郡城故家李鉴明古遗书，残鳞片甲，约有百余种。其可取者四十册而已，至宋元旧刻，无可为披沙之拣。唯此《中州启札》尚属元刻，检钱少詹《元史艺文志》总集类云‘吴弘道《中州启牋》四卷’，与此正合。虽钞补而仍缺失，取其希有，故存之不复分与切庵矣。乙亥二月十四日，复翁。”（参见《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六，清光绪十年[1884]滂喜斋刻本，第51a—51b页）跋语“尚属元刻”之谓，易滋误解。实则此书下明确注出“旧钞本”，知黄丕烈所藏系据元刻抄出的写本，而非元版。

⑧ 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三五“中州启札四卷_{明成化刊本}”，清光绪十三年（1887）灵芬阁印本，第22a页。

黄裳指出“陆心源曾有元刻，与此本行款不同”，这是正确的判断。他应该未见元刊，所以又有“小字狭行，古意纷披，为覆元刻本”的激赏之语^①。明刻洵为善本，但版式与元刻不同，自然不可能是覆刻本。

这两种刻本都罕见流传，清代修纂四库全书就没有征集到此书。四库馆臣根据《永乐大典》的引录，勾稽散见书简，形成了辑佚本二卷。提要称“今考其所载，有赵秉文、元好问、张斯立、杜仁杰诸人札子，大抵皆一时名流。《永乐大典》载宋元启札最夥，其猥滥亦最甚。惟此一编犹稍稍近雅，以文多习见，故亦仅存其目焉。”^② 馆臣认为此书所收录的书简文体古雅，不同于宋元之际的俗滥之体，表现出对其文学价值的肯定。但认为作者多为名流，故书简都属习见之文，却是疏于体察。金元之际文人别集存世者少，此书存人、存文的功用甚巨。馆臣费力蒐辑，却列入存目，从而导致辑佚本最终失传。

此书尚有多本钞本传世，皆为四卷，皆自元刻抄出。南京图书馆所藏者，即张金吾（1787—1829）原藏之“影写元刊本”，《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三五著录。书中天头间有小字校语，卷一之末署有“嘉庆己卯六月二十四日校于新市舟中，梦华”字样，卷四末尾署“二十四日未刻，舟次乌镇，校毕”，则校勘出于何元锡（1766—1829）之手。此书后归丁氏八千卷楼^③，书前有丁申（1829—1887）同治九年（1870）正月题跋。此钞本之可贵在于曾利用明刻本校补阙字，但中间仍有缺逸。国家图书馆亦藏有一钞本，无序文，首页有“古香楼”与“休宁汪季青家藏书籍”两印，知出汪文柏（1659—1725）。此本写缮工致，但阙文甚多，且启札作者具名往往脱漏。台北“国家图书馆”有一钞本，经劳权、刘承幹递藏，前有“丹铅精舍”“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两印，书末附劳权跋语。以上三种钞本以南图本为最善，但各本皆有阙文，且有书页错置现象。因抄写时书简起讫处理不同，各本启札数目也略有差异^④。

《中州启札》传本罕觐，其具体编选情况不甚分明。就选源而言，元好问、许衡、刘因等都属于名家，当时其文集就广为流传，启札当取材于此。卷一所收元好问六首书简，顺序与《遗山先生文集》卷三九“书”完全相同。卷二首篇许衡《与窦先生》一文附有小字校记，提供了别本异文，如“平则文著而行矣”下，注有“一作平则斯文可以行矣”，类似的附注共有十余处，而这些校语与《中州名贤文表》所收许衡文章完全相符。《中州名贤文表》虽然是明人刘昌所选，但其中许衡的文章却来源于元刻本，“《遗书》六卷，大德十年（1306）安成尹苏显忠刻梓，当时已谓残编断简，多所失遗”^⑤。一般以为这是许衡文集的最早刊本，然根据大德本刊行时“残编断简”之说，且《中州启札》成于大德五年，可见《遗书》显然还有更早的刻本存在。《中州启札》所收录许衡之作，除了《与廉宣抚》之外，其余都见于《中州名贤文表》卷四“书牋”，顺序也几乎全同。卷三刘因六首，全见于《静修先生文集》卷二一“书”，顺序亦同。

但《中州启札》选录名家之外，尚有四分之三篇目属于未见别集传世的士人。这部分启札的来源，可能得于友朋之间的传抄，蒐辑应该也耗费了不少时日。卷四后半部分标出“拾遗门”，收录了受书人为游显的大量启札，其中有十八首署名为“无名氏”。此后的启札也多不标署作者。这提示了书简搜录的来源，也可见会聚文献的阶段特征。

① 黄裳《劫余古艳：来燕榭书跋手迹辑存》，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248页。

②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一《中州启札》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下册，第1737页。

③ 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卷一九著录“中州启札四卷元吴弘道撰 爱日精庐影元本”，钱塘丁氏聚珍版，第5b页。

④ 陆心源另有此书四卷“旧钞本”，即黄丕烈所藏者，见《韶宋楼藏书志》卷一一七，今亦归静嘉堂，未见。版本方面，除前揭朱铭坚两文外，花兴《〈中州启札〉的编刻与价值》（《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论丛》，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与王媛《元人总集叙录》（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77—81页）亦有梳理。

⑤ 《中州名贤文表》卷六之末刘昌“跋”，明成化七年（1471）刊本，第16a—16b页。

吴弘道对中州士人书简如此勤加蒐讨，是否别有深意？毕竟在此之前，命名方式类同的《中州集》早已行世。元好问“北渡后网罗遗逸，首以纂集为事，历二十寒暑仅成卷帙”^①，作为金源一代文献集成之作，《中州集》饱寓了故国乔木之思，“元氏之集诗也，以诗系人，以人系传，《中州》之诗，亦金源之史也”^②。但《中州启札》颇有不同，书中只有冠于卷首的赵秉文（1159—1232）卒于金亡之前，属于“金士巨擘”^③。其他作者大都有入元经历，无法以金源“遗民”视之。像刘因这样的大儒，更是完全成长于元代治下的第一代士人。从吴弘道本人的行实来看，他也必然生于金亡之后。他在所作散曲中对元代国力强盛、疆域广大充满自豪，从身份认同而言，吴弘道无疑属于元人，他所用的“中州”一词政治意涵较弱，而更多偏向于地理区位与文化认同。《中州启札》所收作者全为北方士人，核心活动区域也多在中原之境。尽管地理上“中州”曾经为金源故土，但《中州启札》并非用来寄托黍离之思。启札作者既有商挺、姚枢、胡祗遹这样的名臣，也有许衡、郝经、刘因等大儒，亦含王鹗这样的金代状元，还有徐世隆、王构这样的翰苑学士，乌古伦贞则为女真人，甚至可被视作特殊“士人”的有名诗僧木庵性英也列名其中，更多的则是在行省、路司任职的中下层士人。现存金元之际北方士人的书简一共不足二百八十首，其文体风格呈现出朴质平易的统一性，而《中州启札》一书所收就占据了七成以上。《中州启札》的资料来源带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吴弘道所接触到的或为北方刊行的士人文集，或为友朋交好传抄的书简存余，大量无名氏的启札更可能是吴弘道本人随遇所得。然而正是这样的辑录特点，反而较为客观自然地反映出北方文人之间启札交流的真实样态。同他提供《录鬼簿》中诸多人物材料类似，吴弘道本于北方下层文士立场，以勾稽启札的形式，在《中州启札》中表达了他对于金元之际北方文化的体认，并由此而呈现那一转型时代身份复杂的士人们形态丰富的文学样貌。

二 启札：士人交流的文体选择

《中州启札》中的受书人，不乏耶律楚材、刘秉忠、廉希宪这样的重臣。其他多有友朋之间的往来书札，但双方也往往或任地方要职，或署翰苑馆阁，或为参议、省参这样的幕职，都是带有公共职务的精英士人。因而他们之间音问通款，即使并不涉及军国政事，由于社会身份的存在，体现于书简的礼制、书仪甚至文体，都应与小简不同，而带有一定社会交往的功能性特征。根据司马光对书仪的析分，应该有别于表奏、公文与家书，而接近私书一类。吴弘道编选之际，以“启札”命名这类书简，而所收文章均单行散体，朴质简易，这体现出怎样的文体认知？

启与札原本都是以卑达尊的上行文体，带有鲜明的行政公文性质。两汉之际，以“启”命名的文章尚少。刘勰指出“至魏国笔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必敛饬入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亦启之大略也。”^④可见启兴盛于晋之后，在文体方面带有明显的骈体倾向，在功用方面兼具表与奏的功能，既用于陈说政事，也用于辞让谢赐^⑤。至宋代启的文体功能日益下移，演化成为日用文体，举凡仕宦、

① 张德辉《中州集后序》，《中州集》卷首，明汲古阁刊本，第1a页。

② 钱谦益《序》引程嘉燧语，钱谦益撰，许逸民、林淑敏点校《列朝诗集》卷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册，第1页。

③ 脱脱等《金史》卷一一〇《赵秉文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册，第2429页。

④ 刘勰著，杨明照校注《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卷五《奏启》，中华书局2012年版，中册，第315页。

⑤ 徐师曾将启与书、奏记、简、状、疏归入“书记”类“以上六者，秦汉以来，皆用于亲知往来问答之间；而书、启、状、疏，亦以进御。”注意到启作为文体的政治书写与公共交流属性（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与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合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28页）。

荣进、婚冠、祀典、祈禳、朝贺、庆寿、恳事、饯别、干求等诸种场合，都可以用启进行礼仪交流，骈体也成为文体规范“至宋而岁时通候、仕宦迁除、吉凶庆吊，无一事不用启，无一人不用启。其启必以四六，遂于四六之内别有专门。”^①可以说，启已成为士人社会中带有普适应用功能的四六文体。

札作为文体的出现则要晚得多，徐师曾以为“札独行于宋，盛于元，有叠幅提头画一之制，烦猥可鄙”^②，他看到了札在社交应用中重于札数、繁杂泛滥的弊端，但对于文体源流并未细加梳理。这一文体实际起源于唐代，欧阳修称“唐人奏事，非表非状者谓之榜子，亦谓之录子，今谓之札子。凡群臣百司上殿奏事，两制以上非时有所奏陈，皆用札子，中书、枢密院事有不降宣敕者，亦用札子，与两府自相往来亦然。”^③可见在宋代一般大臣奏事，或者两制以上重臣常例之外的上书，所用文体可称为札子；而政府、枢府下行的文书，如果皇帝未曾转降敕书，则也称作札子。札子由浓厚性质的政府文书下移为士人之间交往通谒的文体，是南宋初年的事情，“绍兴初乃用榜子，直书衔及姓名，至今不废”^④。札子作为交际文书的兴起，与其简便亲切、罢去繁冗密切相关。不过社会习俗当中对于尊官的谀颂很难遏止，“俄而札子自二幅增至十幅，每幅皆具衔，其烦弥甚”（《老学庵笔记》卷三，第37页），于是札子的便捷性也被礼文繁数所掩盖。

在这种风气之下，启与札开始并称。宋元之际的熊禾就已经发现“近世士大夫以启札相尚，无乃交相谀者乎？书坊之书遍行天下，凡平日交际应用之书，悉以启札名，其亦文体之变乎？”^⑤社会交往的需要，影响了启与札的文体形制，并使得启札成为日常交往的书简的文体总称。其时士人在拜谒长上之际，多以启说明事委，以札申说敬意，俱用骈俪之体，各用信封密封，外面又附以封纸重加封缄。外封之上多题写“启札申某官台座”字样，于是启札遂合称而成为书简的代名^⑥。这种特殊的形制就是宋人常说的“双书”：“宣和间虽风俗已尚谄谀，然犹趣简便。久之，乃有以骈俪笺启与手书俱行者。主于笺启，故谓手书为小简，然犹各为一缄。已而或厄于书吏，不能俱达，于是骈缄之，谓之双书。”（《老学庵笔记》卷三，第37页）双书在南宋非常流行，其中的札往往有多幅，故又被称为“叠幅”，以多为敬，札数繁缛。又因叠幅过多而兴起单幅样式，但为了表达尊敬，而不断另作一行，被称为“提头”；在提头之时，语句开始的“某”之前画上“一”字标示谦卑，被称作“画一”，都是社会交往中礼仪需要过于突出的表现。有识之士对此颇感无奈“今风俗日以偷薄，士大夫之狃浮者，于尺牍之间，益出新巧。习贯自然，虽有先达笃实之贤，亦不敢自拔以速嘲骂。每诒书多至十数纸，必系衔，相与之际，悉忘其真，言语不情，诚意扫地。”^⑦但社会风气的影响无远弗届，士人多被裹挟其中。

这不仅带来日常交流中的烦扰，也使得书简本来应有的叙明事实、交流情感功能，变成文书的格式化表达，从而落入俗套。启札的社交功能溢出文体表达需要，形制规范超越了内容的书写要求，于是启札文体日益虚化“沿波不返，遂变为类书之外编、公牒之副本，而冗滥极矣。”^⑧为了满足社会交往的实际需要，宋元之际的启札类日用类书层出不穷。流传到今天的，仍然有《新编通用启札截江网》《新编事文类聚启札云锦》《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等多种。书中对启札的对象、场合、事实、诗词、格式、活套等，有详细的罗列，往往只需按图索骥，根据人、事、

①⑧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三《四六标准》提要，下册，第1396页。

② 《文体明辨序说》（与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合刊），第128页。

③ 欧阳修《归田录》卷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页。

④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页。

⑤ 熊禾《勿轩集》卷一《翰墨全书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8册，第765页。

⑥ 宋元之际启札的具体样式，可参见《新编事文类聚启札天章》卷一之“札子式”，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

⑦ 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五《蔡君谟帖语》，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6页。

时、地对文字稍作调整，即可满足书问启札的依样填写。

在这样的启札文化场景中，再来体察《中州启札》的编选，就不难发现书简所呈现的文体面貌，与南方士人社会的启札样态有何等差别。所有的书简都以古文写就，文辞简练质朴，直述事实，情谊真淳。格式中的时暄、祝颂，也都寥寥数语示意而已。就是在给当时的重臣耶律楚材上书，求请其接引中州士人，使之免于奴役奔走之辱，元好问也只是“谨斋沐献书中书相公阁下”，而与南方启札的不胜烦渎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更不用说平交之间的往还，随意简古而脱略形式了。

无怪乎当许善胜为此书作序时，这位前朝进士、深谙时弊的南方士人发出了深沉的喟叹。许善胜是温州永嘉人，咸淳乙丑（1265）进士^①。他在南宋既曾入直翰苑，则对于制诰笺表之类四六馆阁文体的熟悉自不待言，对于社会交往中的谄媚奔竞、文字浮靡之弊也有切肤之感。序言中明确提示书简应效仿古人，以洞达直切为宗，而不应浮文媚俗。当他作为“后进”而目睹前贤的四六馆阁之作，每每叹为观止，将这些涉及国计民生的政府文书，视为不可或缺的大手笔。而宋社既屋的易代之变以后，他有机会阅读中原通行的书简文字，不免发现江南字斟句酌、工整雅饬的启札之作，不过是徒具形式的“五云体”罢了^②。中原启札抒情达意，浑成简古，直追远古之风，又可示法于后，与典重庄严的朝廷文字，在价值上皆可视作谷粟布帛之文。

因而《中州启札》的荟聚成书，对于宋元之际的南方文坛而言，是一种突出的文体呈现。在文体选择上，骈四俪六、偶对精工的整体形式被洒脱随意、自然成文的散体取代；在表达功能上，虚文表敬、炫技谄颂被直通款曲、真切交流代替。中州士人通过质实简古、传事述情的畅达书写，剥离了启札文化中所附着文胜灭质、礼数滥侈的繁文缛节，实现了启札的文体功能回归。在宋金对峙之后南北文坛分流衍化的背景下，中州词翰更多延续传承了北宋以来质朴自然、平易清澹的文学传统，与南宋流行的灭裂文字、猥杂缛丽习气形成鲜明对比。《中州启札》在江南刊版不仅是对中原文化的传播，也是北宋文学传统的回转，更实现了对南方文风的去蔽，从而带有促进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意味。

其实《中州启札》的出现并非孤明先发，与之几乎同时的《欧苏手简》四卷，也是性质类似的书简总集。在杜仁杰（他曾中金源进士，声名四驰，也是元曲名家，其书简收录在《中州启札》当中）的序言中，他激赏欧苏之作“但见性情，不见文字”。这些手简形制短小自由，语言简练生动，风格洒脱有致，带有生活化、日常化的特点，亲切有味而语近情真。古人早已看出，“宋末启札之文，多喜配合经史成语，凑泊生硬。又喜参文句，往往冗长萎弱，唐以前旧格荡然”^③。正是这两部元刻书简中的“古意”，使中州士人的启札，与北宋以来确立的欧苏典型具有了共同的文体与精神渊源。

三 《中州启札》中的诗词酬酢

随着蒙古兵南下，金朝在经历贞祐南渡、壬辰北渡等一系列仓皇政治事变之后走向衰亡。在这

^① 弘治《温州府志》卷一三，弘治十六年刻本。许善胜入元后任职学事，在为《中州启札》作序的大德五年，为江西儒学副提举。乾隆《武昌县志》卷一〇录其《马侯修学记》，此文作于九年春县学落成之时（1305），内称“余叨董湖广学事”，则当为湖广行省儒学提举。大德十一年（1307）秋在鹤矶舟中为黎前《安南志略》作序，鹤矶即武昌蛇山。同治《上高县志》卷一〇收录其延祐二年（1315）十一月所作《正德书院记》，署衔为“承事郎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按元制提举从五品，副提举从七品，承事郎为教授正七品散官，故“承事郎”云云必有讹误。后两文《全文》亦失收。

^② 段成式称韦陟“每令侍婢主尺牍，往来复章未常自札，受意而已。词旨重轻，正合陟意，而书体遒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尝自谓所书‘陟’字如五朵云，当时人多仿效，谓之‘郇公五云体’”（参见段成式撰，许逸民校笺《酉阳杂俎校笺》续集卷三，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册，第1610页）。故五云体往往用来作为他人书信的敬称。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四《勿斋集》提要，下册，第1407页。

一惨酷历史进程中，生民罹难，中原残破，“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矣”^①。士人在这一巨变中遭受冲击尤烈，“自经丧乱，衣冠之士逃难解散，糊其口于四方者多矣”^②。不过《中州启札》中所涉及的士人生活，都是在这一惨淡时刻之后。元代初定中原，对汉法与儒学已有一定程度了解与接受，士人处境大有好转并渐次得到起用。经由各种途径出仕，或者得到北方世侯庇护礼遇的士人，在文化层面开始崭露头角，由北方南下为官的中州士人开始出现^③。在江南士人初始印象中，“自中州而之官南土者，大率皆资性纯朴、材力猛健之士，故所至俱以吏能显”^④，大概并不以文学之士目之。那么对于在文物凋敝、衣冠狼狈之后重归舞台的中州士人而言，文学活动在他们的生活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

《中州启札》内容广泛，其中映现的诗文活动仅是士人生活之一端，但书简中出现的诗词却多为《全元诗》《全元词》失收。元好问在当时负斯文之寄，“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⑤。在给刘秉忠的信中，他不仅指示门径，还不无自负地表示“至于量体裁，审音节，权利病，证真贗，考古今诗人之变，有黷直而无姑息。虽古人复生，未敢多让。”（卷一《答聪上人》）致书优遇自己的东平世侯，他也涉笔艺文“所需《横笛侍女图》今奉去，《树萱堂记》相见下笔未晚，《欵器赋》全文并跋语千万录寄，欲入《见闻录》中。”（卷一《答大用万户》之二）可见他稍脱颠沛流离，即能寄心文教，启瀹后学。

《中州启札》中的艺文之士，颇有与元好问相从甚密或者直接问学者，体现了领袖文人的深远影响力。著名诗僧木庵，以诗为简，与临济禅僧海云印简（1202—1257）通问往来：

某礼上海云大老文侍。次韵子玉兄拙诗奉寄某，为千里一笑。墙阴残雪半融春，白发又随时节新。老矣久无题柱志，悠哉空有卧云身。逢人开口须防错，对景吟诗莫厌频。风月未知谁是主，料应都付与闲人。国师到燕，谨依命厚待。在城禅教师德，皆望象驾还燕，不敢多嘱。（卷一《与海云长老》）

木庵名性英，字粹中，与元好问有诗文之契，“接迹于赵礼部（秉文）、李屏山（纯甫）之后，定交于雷御史（渊）、元遗山（好问）之间。字如东晋而不凡，诗似晚唐而能雅”^⑥。元好问曾为其诗集作序，许之为“百年以来为诗僧家第一代者”^⑦。

元好问弟子许楫也颇善吟咏，他甚至以诗词为具，作为交流请托的凭借。许楫（1224—1293）字公度，号蒙泉，太原忻州人。他“幼从元裕学，年十五，以儒生中词赋选”^⑧，深得丞相安童、左丞许衡器重，后仕至东平总管。许楫在给魏初的书简中附上了一首词：

某顿首再拜。久别不胜仰德之至，谨录呈寄司农焦少卿《太常引》一阙，为公余一笑。山城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鞞鞞款塞》，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50页。

② 李庭《寓庵集》卷四《嵩阳归隐图序》，清宣统二年（1910）藕香零拾本，第36a页。

③ 这一时期的士人际遇，可参见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④ 陆文圭《墙东类稿》卷五《送曹士开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4册，第579页。

⑤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遗山集》提要，下册，第1421页。

⑥ 魏初《青崖集》卷五《木庵塔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8册，第783页。

⑦ 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五《木庵诗集序》，中华书局2012年版，上册，第1086页。性英生平行实，刘晓《金元之际诗僧性英事迹考略》有详细考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3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但论文述及性英存世诗歌，则仅举出残句，而未能留意及此。杨弘道、段成己、耶律楚材、耶律铸、王恽、元好问皆与性英唱和并有诗存世，《全元诗》则无释性英条目。

⑧ 宋濂等撰《元史》卷一九一《许楫列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册，第4357页。按《元史》中凡元好问皆作“元裕”，实误。清人汪辉祖已指出“元好问字裕之，不书名而称字，又删‘之’字，皆误”（参见汪辉祖撰，姚景安点校《元史本证》卷二一，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22页）。

无事日从容。闲杀白头翁。天地一春风。正四海、车书混同。 阴阴桑柘，熙熙村落，箫鼓庆年丰。鞍马记相从。也曾是、巡行劝农。少息：李达伯通为人直实，与仆相从数年，自今闲困，伏望少赐吹嘘，为千万幸。不宣。（卷四《与魏太初青崖》）

这是以词稍事寒暄，而求为友人李达谋取职事。魏初（1232—1292）为弘州顺圣人，“好读书，尤长于《春秋》，为文简而有法，比冠，有声”^①，官至南台御史中丞。魏初有《青崖集》传世，“所作皆格律坚苍，不失先民轨范”^②。从文学渊源而言，据其自述“岁丙辰，遗山元先生入燕，初朝夕奉杖履”^③。正由于“尝辱先生教诲”^④，魏初行部河东时，特意为元好问买石立碑。除了官场的交往，他与许楫并为元好问弟子辈而有同门之谊。

许楫应该同时为李达写了好几通推荐信，在《与谢化度禅师》中他开门见山点出“李某”，希望“如到大都，凡百照顾”。而在给刘宣的书简中，他则又以诗联络感情，委婉达意：

某顿首再拜某文侍。寄汉臣宣慰石公俚语录呈，希笑览。二十年前鬓未斑，披霜带月不曾闲。城东相府城中省，一日联镳几往还。（其一）弊裘羸马走尘埃，愚钝甘为（不〔最〕）下材。自愧晚年荣且贵，初从宣慰荐章来。（其二）鞍马区区各异方，几年无处问行藏。旧时一枕思君梦，夜夜还飞到健康。（其三）不肖行藏，去人李某备知其详，不敢喋喋。旦暮不忘损益。二斋相君执事，不宣。（卷四《与刘吏部尚书伯宣》）

刘宣（1233—1288）字伯宣，太原人。其父刘训，“金朝河南省掾，博学知名，与太原元好问友”^⑤。刘宣“自幼喜读书，有经世之志”^⑥，仕至南台御史中丞。魏初与刘宣亦有交谊，曾“举劝农副使刘宣自代”^⑦。刘宣为吏部尚书，时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至元二十五年（1288）刘宣已赴行台任职。许楫去信向他推荐“李某”，只能是这两年当中。刘宣虽以吏才见长，实也能诗，“江南既平，作诗百韵，铺张伟绩，宋臣有能死节守义者必加叹奖”^⑧。日常琐事、行履细节，推介前去的李达自然会讲述，于是以诗代简就完全成为情感交流，这不失为有共同艺文爱好的同僚之间的联谊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许楫的两封书简中所附诗词，唱和对象都不是受书人，而另有所属，这隐约表明各人都较为熟悉，彼此的酬唱属于公共话题。

除了元好问影响之下的士人，《中州启札》中的诗词活动也呈现出两个中心人物。其中一个为吕逊（1209—1273），字子谦，东平人。他与王恽、魏初都有交往。其父吕松，“金词赋进士第”，吕逊本人“早岁有赋声，生平喜作诗，格律精严，长于七言近体”^⑨。吕逊一直沉沦于吏职，主要在北方的燕城、真定、东平、卫州等地活动，最终卒于江淮都转运司幕官任上。虽官职并不显赫，但吕逊辗转多地，交游广泛，交往圈中有不少诗文作手。如久居东平的杨云鹏，他是元好问向耶律楚材推荐的中州名士之一，曾自称“时时雕肝割肾，偶得一联一咏，聊以自适”（卷一《与吕子谦详议》）。据说这是一位“死生于诗者”，“客居东平将二十年，有诗近二千首”^⑩。杜仁杰则在书简中给吕逊抄录四首

① 《元史》卷一六四《魏初列传》，第13册，第3856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青崖集》提要，下册，第1431页。

③ 《青崖集》卷二《赠高道凝》，第704页。

④ 《青崖集》卷五《书元遗山墓石后》，第784页。

⑤ 吴澄《吴文正集》卷八八《刘忠宪公行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828页。

⑥ 《元史》卷一六八《刘宣列传》，第13册，第3951页。

⑦ 《元史》卷一六四《魏初列传》，第13册，第3858页。

⑧ 《吴文正集》卷八八《刘忠宪公行状》，第823页。

⑨ 王恽著，杨亮、钟彦飞点校《王恽全集汇校》卷一五《挽吕权漕子谦》，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册，第678页。

⑩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六《陶然集诗序》，下册，第1147—1148页。

诗，同时期望这位“天下士”能够“不吝点窜”（卷一《与吕子谦郎中》）。更有一位“但爱缀诗”的朋友，一次性给吕逊寄去了六十三首诗歌（卷三王仲谟《与吕子谦》）。可以看出，吕逊的书简往来中，文学唱和的频度相当之高。

这其中就有开国名臣姚枢（1203—1280）。在书简中，姚枢录上了一首五古：

某顿首某阁下。重过课湍蘸，录呈某一笑。沙草覆平冈，经过忆畴昔。解鞍息汗颜，蒙茸藉柔碧。日月曾几何，归路满秋色。乾坤嗟飞蓬，人生亦飘忽。风尘弊征裘，杂沓弓刀陌。勋业愧清镜，双毛渍冰雪。从军壮年事，胡为重兹役？矫首望南垂，惨淡风云集。东平仗黄钺，骑虞自良德。千秋武惠心，赖耳忧疑释。君有少语，尚祈留意。未间，千万以斯文自寿为禱，不既。（卷一《与吕子谦参议》）

姚枢曾经隐居于卫州的苏门山讲学近十年，此后即应忽必烈之招北上，成为重要的潜邸宾僚。而吕逊人生后二十年则基本都在卫州的江淮都转运司任职。这篇书简的署衔是“姚左丞”，姚枢“拜中书左丞”事在中统四年（1263）。从诗歌可以知道这是姚枢重历故地后，北归回望之际所作。“东平”四句，表明此行为目的在于汉人世侯东平严氏。世侯臣服于元代统治，有纳贡、从征的义务，也可世袭职守，专制一方，是元代初期特定政治、军事形势下的需要。忽必烈即位当年（1260），设立十道宣抚使以牵制世侯权力，“诸侯惟严忠济为强横难制，乃以公为东平。至居庸北，制下，受命即南”^①。至元元年（1264）罢去世侯，更置牧守，“迁转河东、山西、河南、山东官吏。公行省河东、山西，明年而归”^②。可见姚枢此年复南下巡行，次年北上而有此诗。姚枢此时已进身重臣，而给邻近的吕逊去信，两人显然是旧交。

同样与卫州深有渊源的王博文（1223—1288）也是吕逊的诗友。博文字子勉，号西溪老人，东鲁人，后徙彰德。他从学于元好问^③，是卫州州学诸多生徒中的“魁杰”^④，与王恽、王旭并称“三王”^⑤。他的书简以诗歌唱和为主要内容：

某顿首呈。一别思仰深剧。新所作《宿修武传舍》丑恶，谨为吾兄录之：白石清泉笑我劳，黄尘赤日与相磨。前修炳炳虽堪佩，世网恢恢未易逃。俯仰桔槔随舍用，步趋傀儡听持操。吁嗟身世坐如此，独对西风首重搔。丙辰岁九月旦日也。谨奉呈布闻。（卷三《与吕子谦》）

王博文于宪宗五年（1255）与郝经一起被忽必烈征召北上，在这之前的几年吕逊方才南下卫州供职幕府，两人在卫州的交往中，诗文交流一定是其中有共鸣的一环吧。

《中州启札》中诗词唱和的另一位中心人物张斯立则要显赫得多。张斯立字可与，号绣江，济南章丘人。家世富饶，其父创有乡塾。张斯立“幼颖悟过人，日诵数千言。及长，刻意问学，无所务为，无所不窥，辟山东提刑按察司掾史”。此后“擢江南行台监察御史，转行省员外郎、郎中，入为户部侍郎、参议中书省事、户部尚书，出金江浙行省事。扬历中外，蔚有名卿、才大夫之目”^⑥。大德元年（1297）至七年（1303），任中书参知政事^⑦。张斯立由吏职出仕而最终晋身参政，这是元代重吏轻儒的特殊任官制度下的独特现象。张斯立本人雅好文艺，任职浙东时与书法大家鲜于枢交好。他收藏的

① 姚燧《姚燧集》卷一五《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0页。

② 《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姚燧集》，第221页。

③ 王恽《御史中丞王公谏文》称王博文“文辞翰墨，外彪中弼。年甫弱冠，四擅华声。从元问学，馆申作甥”（《王恽全集汇校》卷六四，第6册，第2756页）。

④ 王公孺《卫辉路庙学兴建记》，《全元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册，第253页。

⑤ 王公孺《文定王公神道碑铭》称王恽“少与西溪、春山友善，时目曰‘淇上三王’”（《全元文》，第13册，第259页）。王恽《王尚书子勉挽辞》之三也有“三王鼎足”之说（《王恽全集汇校》卷一九，第3册，第898页）。

⑥ 阎复《中书参知政事张公先莹碑铭》，《全元文》，第9册，第303页。

⑦ 《元史》卷一一二《宰相年表》，第9册，第2806—2809页。

名人字画也非常之多^①。仅从存世作品而言，其时名流如魏初、张伯淳、陆文圭、王旭、刘敏中、侯克中、马绍、张之翰等，都与之有诗词唱和。可以说，艺文活动构成了他生涯中的重要面相，这在《中州启札》中有突出的表现。

王博文至元十九年（1282）入朝为礼部尚书，与张斯立同在中书省任职。张斯立以才具而出任江浙行省佥事，王博文作诗为贺：

某顿首上。可与长幕府数年，论思可否，忠益弘多。丞相以为才，保升签省。老夫喜以诗以贺之。几年兰省幕中宾，违覆得中多策勋。葛亮常思友元直，薛宣终不吏朱云。官阶才选休言峻，王事贤劳莫惮勤。上宰从今欲高枕，诚心公道正须君。善加鼎食，不次。（卷三《与张绣江可与》之一）

诗中借用薛宣礼遇朱云的典故，暗示宰相对他的器重，可以看出王博文对他的期许。至元二十三年王博文迁南台中丞，其时行台置署于建康。而张斯立此时为佥书江浙省事，省治为扬州。两地隔江相望，王博文以词相寄：

某顿首。某郎中英游，望某为具婺源许侯公度与不肖三数友。适乐府马生以合曲侑歌遗山《木兰花》词，各欢意浹洽而散。谨次高韵以纪之，《金缕曲》也。樽俎风流地。正扬州、春光烂熳，万红千翠。好客孟公才举酒，早唱珠绳银字。要万斛、羁愁顿洗。病后老怀浑怯饮，道余年、行乐为佳耳。犀首辈，我非是。君如骐驎思千里。笑池边、蹒跚跛鼈，岂能如此。只欲茶铛禅榻畔，寻觅老人风味。更谁想、紫云堆里。乐子归田元有约，效乐天、中隐宁无意。犹在路，恐非计。至元丁亥清明前五日录呈。伏惟一笑云。不宣。（卷三《与张绣江可与》之二）

书简中所说的“婺源许侯公度”即许楫，他在至元二十三年“授中议大夫、徽州总管”，二十四年（1287）“授太中大夫、东平总管”^②。王博文能与许楫一起聚会，当是许楫徽州考满北上，正好路经建康。

张斯立的诗友众多，公余诗酒流连自属常态。王复在集会之后，作诗给他回顾酣饮之乐：

某顿首。古人有真率会，前日农圃之饮，可以当之。用漳束韵，呈同坐诸老一笑云。夙驾从近郊，草露凄已白。鸡鸣达京阙，寒月照行色。瀛洲霭佳士，此际来挈榼。相逢金闺彦，野饮信酣适。农家场圃宽，纓弁俄云集。争持无算爵，宁辨不速客。肴饘杂市酤_{去声}，诘假烹悬特。欢哗破寒律，和气回黍禽。醉倒忘登车，真游本无迹。自爱，不宣。（卷三《与张可与》）

王复（1226—1289）字子初，沧州人。其父王昌龄受知于世侯史天泽，摄卫州事，兴学化民，文风蔚兴。王复与王恽两家为世交，两人亦为州学同学，游从密切。王复后袭父职出仕，领卫州务。至元初入为中书两司郎中，八年（1272）以中书舍人出知归德府。后仕至河东山西道按察使^③。这首诗写到众人仿真率会，在京郊的农家田圃饮乐，应该是王复与张斯立都在大都任职的至元初年。

刘宣与张斯立原本私交甚笃，张“为行省员外郎时，公为参议，相得甚欢”^④。当张斯立为江浙行省左丞时，刘宣正在江西湖东道提刑按察使任上，于是以词为贺：

某顿首。某自左辖相公还省移杭，士民欢呼雷动。某僻处豫章，不克致贺忱，歉恨良多。因邢良辅国录之钱塘，谨录旧作《思归》[木兰花慢]，不揆荒斐，以代起居之敬，伏冀退食捧腹。倦东南留滞，又持节、入西州。信吴楚迢遥，山川环绕，物人风流。长空淡然无际，甚消沉、不尽古今愁。落日江烟杳杳，西风汉水悠悠。几回徙倚仲宣楼，点检鬓毛秋。叹富贵浮云，生存

① 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上《张可与斯立号绣江所藏》，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80—281页。

② 《元史》卷一九一《许楫列传》，第14册，第4358—4359页。

③ 王复生平见《故正义大夫前御史中丞王公墓志铭》，《王恽全集汇校》卷四九，第6册，第2339—2344页。

④ 《吴文正集》卷八八《刘忠宪公行状》，第827页。

华屋，零落山丘。还家故人谁在，共晋溪、佳处卜菟裘。毕竟五花骄马，争如十角黄牛。珍重，不宣。（卷三《与张可与》）

之前刘宣辗转于松江知府、浙西宣慰同知、江淮行省参议任上，遍历松江、苏州、扬州等东南州郡。此番又由吴入楚，来到南昌，山川浩渺，不免兴起归隐晋溪的念头。

与张斯立诗文往来的还有曾与刘宣有同朝经历的张孔孙（1233—1307）。张孔孙字梦符，其父张之纯为东平严氏万户府参议，孔孙遂长育于东平。他“素以文学名，且善琴，工画山水竹石”，以奉礼郎教习乐师、复太常乐入仕。他深为廉希宪、安童器重，至元二十二年（1285）“除宣吏部尚书，孔孙礼部侍郎，寻升孔孙礼部尚书”，后“拜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商议中书省事”，“久之，请老还家”^①。张孔孙有两封书简致张斯立，恰好诗、词各附一首：

某顿首郎中宗旧阁下。因读白乐天作《花前叹》，是年公五十有五，中有“几人得老莫自嫌”之句，叹赏之余，亦得数语录呈。梦里钟声起早难，坐延昼景散迟安。不嫌镜里人垂老，但觉花前岁减欢。谬欲操持存晚节，愧无喉舌在春官。乐天岂是忘情者，叹息流年顿酒宽。蔡大使行，录寄别后一笑。犬子新在彼，望多指教，受赐一也。不宣。（卷四《与张可与郎中》之一）

某顿首。二月初吉，访太初侍御兄，别圃有杏花一株，遂成小酌。人各霏醉，偶得乐府《谒金门》纪一时之欢，二三知友已有和章，录呈。中和节。小圃暮寒犹怯。一树恼人无处说。客来当意惬。粉淡更宜红颊。莫遣东风开彻。醉梦只消疏影月。化为枝上蝶。共发一笑。（卷四《与张可与郎中》之二）

第一札以诗见意，顺带将其子托付时在江浙的张斯立庇护。第二札中的“太初侍御”即魏初，张孔孙迁礼部之前为南台治书侍御史，两人在杭州多所游从，时相唱和。

待张斯立参政中书之后，京城中同好欢聚酬唱的机会更多，《中州启札》中有两封书简都是其此期所作：

某顿首载拜大参相公阁下。别后不胜思慕，因建德门待晓同饮，谬作录上一笑。禁闼不容呼，坐待东方白。盘盘孤月辉，烂烂亦星色。方寒念麴生，乃复得盈榼。群贤更酢酬，为乐贵欣适。野人场圃间，惠然肯翔集。顾皆非折简，率尔可召客。迟明各茗芋，一笑亦奇特。恨我饮酒少，不解登三龠。独能赋清诗，为诸君遗迹。不宣。（卷四宋渤《与张可与》）

某顿首。某因见坡翁清白和陶诗，为子由弟作也。仆于是日偶读是诗，惕然兴感，辄亦次韵，录呈颐贞大参老兄，伏幸笑览。层云起中宵，翳我窗户阴。谓当为膏澍，喜气袭冲襟。长风自何来，鉴竹铿玉琴。嚶然万籁作，曙色昨犹今。佳辰愆严祀，先训夙所钦。涤濯静且嘉，蔬肴侑清斟。独念我仲兄，两月无乡音。六十未全衰，早已辞华簪。有弟不归去，世味耽之深。不宣。（卷四王构《与张可与》）

宋渤字齐彦，潞州人，宋子贞之子，官至集贤学士。王构（1245—1310）字肯堂，东平人。至元十一年（1274）授翰林编修，武宗时拜翰林学士承旨。王构是元初著名文臣，“历事三朝，练习台阁典故，凡祖宗谥册册文皆所撰定，朝廷每有大议，必咨访焉”。诗中归乡退隐之思浓郁，他后来“以疾归东平”^②，与诗中“世味耽之深”的自嘲潜相呼应。

不消说，书简所见诗文交往圈只是实况的一角^③。东平徐琰就对张斯立表示“不肖尝有诗，因便

① 《元史》卷一七四《张孔孙列传》，第13册，第4066—4068页。

② 《元史》卷一六四《王构列传》，第13册，第3856页。

③ 《中州启札》卷四拾遗门收录了一篇无名氏上呈时任大名宣抚使游显（1210—1283）的书简，附诗云“相逢莫怪便倾诚，二十年前契友情。今日愿为门下客，免教人道是书生。”这其实是希望不参加每月的讲学活动，而作诗证明这并非自己不学的借口。

寄足下”(卷四《与张可与郎中》之三),胡祇遹(1227—1295)也专门为张斯立的“颐贞斋”题诗^①。现实生活当中的诗词酬酢肯定比书简邮送的远为丰富。书简呈现只是诗文生活的片段,而酒酣耳热之时才是更合适笔墨淋漓的交际场合。王鹗(1190—1273)对吕逊所说的“燕城土风比旧日差胜,释奠破官钱,月旦必告朔,文会欢饮,无月无之,但欠吾子谦耳”(卷一《与吕子谦参议》之二),恰好揭示出诗简筒送的无奈。

《中州启札》书简中除了胡祇遹的一首外,共录呈了诗歌十二首、词作四阙,全为不见于其他文献的逸作,诗文交流是启札往复的重要内容。参与酬酢的士人身份不同,经历迥异,却因共同的文艺爱好而联络网结到一起。启札所呈现出的诗文唱和中心人物吕逊与张斯立,一沉晦,一显达;交往对象不乏重臣,也颇有幕职。这种交流不以势利而绾合,而带有文艺相娱的自然组合意味。尽管因启札搜罗范围限制,其中映现出的士人网络有所局限,活跃唱和者的出现带有一定或然性,但也足以见出北方士人对于诗词唱和的热情。

如果将之与同一时期在大都进行的著名文人集会“雪堂雅集”的作家名单进行对比,就会发现或然之中深味存焉。大约在至元十九年至二十年(1283),大都天庆寺的临济僧人普仁在其禅室举办了诗文雅集活动,根据王恽的记述,“凡一十九人,作为文字,道其不凡”^②。这些作品汇录成卷,姚燧在题跋中罗列有“序四、诗十有九、跋一、真赞十七、《送丰州行诗》九,凡五十篇”,作者共二十八人^③。人数记载不一,或是出于雅集之后仍有赓和,从而使雅集带有一定的延续性。有学者指出,雅集“以参与者档次高著称”,“只要略做增补,这便是至元后期大都文坛的主要作家名单”^④。不难发现,《中州启札》中的诗词活动主体,如张斯立、徐琰、王构、王恽、宋渤、张孔孙、王博文、刘宣、胡祇遹,都出现在这一“主要作家名单”当中。《中州启札》的书简中直接引录具体诗词作品的就有十五篇之多,如果算上言谈涉及艺文者,其数量更超过三十首,直观反映了文学交流如何深入北方士人的日常生活。考虑到此书资料来源的或然性,启札中诗词酬酢的主角竟然也与当时文坛主流相互重合,并与北方文坛的地域格局呈现一致,也许可以说,《中州启札》中的诗文酬酢,以一种自然状态,呈现了金元之际北方士人文坛的现实生态。

四 余论

日本学者安部健夫曾把元初知识分子分为文章派的华士与德行派的正士两大集团,“一是由耶律楚材、宋子贞兴起,元好问、康晔、王鹗、王磐、李昶、李桢、阎复、李谦、孟祺、张孔孙、李之绍、曹伯启等继之,下及李冶、徒单公履的一派;另一是由杨惟中、刘秉忠、赵复兴起,窦默、姚枢、许衡、杨恭懿、王恂等继之,下及耶律有尚、姚燧、甚至还可把刘因包括在内的一派”^⑤。从事业追求、个性修养、道德约束等角度来看,文苑与儒林的大致区别在元初士人当中是确实存在的,《中州启札》中的书简收授士人,也与安部健夫所列举者多有重合,构成了其时北方士人的主体。

但是元朝入主内地,其任官制度与中原王朝多有不同,文士的地位并不特出。由于重出身、讲根脚,由吏入仕甚至由儒入吏的现象反而更占主流。能够亲理民政、解决实际问题的经济之士才是更受

① 此诗见卷三胡祇遹《与张可与》之二,《紫山大全集》卷三题作《寄张郎中可与颐贞》,与《中州启札》所收者略有异文。

② 《王恽全集汇校》卷五七《大元国大都创建天庆寺碑铭并序》,第6册,第2548页。

③ 姚燧《姚燧集》卷三一《跋雪堂雅集后》,第472—473页。

④ 杨镰《元代文学编年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

⑤ 安部健夫《元代的知识分子和科举》,《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5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71页。

重视的群体，耶律楚材以及此后的杨惟中、姚枢、刘秉忠等忽必烈金莲川幕府时代的“潜邸旧侣”，都是以此而得到重用。在元代士人当中，除了喜好诗文酬和的文章派与重视道德修养的德行派，可能更普遍的大多数其实是介于两者之间，以吏治才干而见用的士人。《中州启札》中呈现出的诗词作者，除王鶚、魏初、木庵、王构等可被归入文章派，像吕逊、张斯立这样的中心人物，及许楫、刘宣等众多作手，其实多属于具有文化素养的官员。他们出自爱好的追逐风雅行为，成为与两派成员沟通的有效手段。

在这些酬酢活动当中，也隐约呈现了金元之际北方的地域文学中心。从元好问开始，杜仁杰、杨云鹏、王构、宋渤、张孔孙、徐琰等人，或受惠于东平世侯，或长育于东鲁之地，是其时异常活跃的东平士人群体的组成部分。而王复、王博文、王恽、吕逊等，则属于卫州士人群。这与两地在元初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与文教政策有关，“方是时，士大夫各趋所依以自存。若夫礼乐之器、文艺之学、人材所归，未有过于东鲁者矣。世祖皇帝建元启祚，政事文学之彬彬然为朝廷出者，东鲁之人居多焉”^①。卫州时为世侯史天泽投下，文教兴盛，府学人才辈出，有“鲁多儒而卫多君子”^②之誉。这两个士人群体以开放姿态密切交往：元好问曾客居两地；魏初既与张斯立唱和，也是王博文的旧友；张孔孙既是张斯立的“宗旧”，也是魏初的“知友”。他们交相为友，诗词赓和，丰富了北方的文坛。

但也需注意，他们虽然大部分都有任职江南的经历，像编纂《中州启札》的吴弘道本人，也“虚名仕途，微官苟禄。愁里南闽，客里东吴，梦里西湖”^③，辗转于南方各地。但他们的交游唱和，却多以北方士人内部为主，与南方士人的切磋属和甚少。他们的诗词质朴充实，古意盎然，与南方仍具影响的江湖萎靡诗风对比鲜明；他们的启札自然真挚，也与宋末文章的庸滥俗套大相径庭。这是贞祐南渡之后，北方文风的可贵一面，“南渡以来，士人多为古学，以著文作诗相高”^④。但于南方文学中体制形式丰富、技巧高度发达的一面，则借镜无多。正如钱基博所述“元以蒙古起朔方，牧马南下，吞金灭宋而抚有中国；然元能兼并金宋之土地，而未能统一南北之文学。”^⑤故《中州启札》中的文学活动，更多体现了元初北方质朴古直的文学生态。元代南北混一、族群融合而产生的兴盛文学局面，要等到汉法得以施行、科举制度重开、南人大举入仕之时，这要在《中州启札》刊行的十余年之后了。

【作者简介】慈波，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出版过专著《文话流变研究》等。

（责任编辑 刘京臣）

① 虞集《曹文贞公汉泉漫稿序》，《全元文》，第26册，第106页。

② 王公孺《卫辉路庙学兴建记》，《全元文》，第13册，第253页。

③ 吴弘道《钱塘感旧》，《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版，上册，第729页。

④ 刘祁《归潜志》卷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0页。

⑤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第五章《元》第一节《发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中册，第695页。